

满洲人在东北

(十七世纪)

[苏] 格·瓦·麦利霍夫 著



满洲人在东北

(十七世纪)

〔苏〕格·瓦·麦利霍夫著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年·北京

本书用中国文献揭示了满洲国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在远东的侵略政策，满洲诸部的聚集史以及满洲人与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部族相互关系的性质，阐明了东北的管理制度以及清朝当局对该地区的经济开发，同时记述了清帝国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俄国领地的侵略。（原书内容简介）

Г. В. Мелихов

МАНЬЧУРЫ НА СЕВЕРОВОСТОКЕ

(XVII 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4.

2380/10

内部发行

满洲人在东北

(十七世纪)

〔苏〕格·瓦·麦利霍夫著

黑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第三室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 10印张 238千字

1976年5月第1版 1976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11017·367 定价：1.4元

出版说明

近年来,苏修叛徒集团为了推行霸权主义和领土扩张政策,指使其御用学者,炮制了许多歪曲、篡改中国历史的文章和专题著作。苏联科学出版社东方文献总编辑部在1974年出版的《满洲人在东北》就是其中的一种。

作者格·瓦·麦利霍夫,是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的一个修正主义御用文人,是一个卖力反华的小丑。他在六十年代,曾抛出过几篇与满族或清朝初期历史有关的文章,在此基础上又拼凑成《满洲人在东北》一书。

这部书摆出一副大架式,旁征博引,大量堆砌史料,书后罗列的书目竟达三百四十多种。从表面上看,作者好象是在搞什么“学术研究”。其实,这完全是装腔作势,借以骗人。该书作者根本不是出于学术兴趣要研究满洲人在东北的历史,而是为着一种明显的政治目的在搞反华宣传。他打着学术研究的幌子,明目张胆地歪曲、篡改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的历史,赤裸裸地为老沙皇侵华罪行辩护,并为新沙皇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舆论。

这部书尽管篇幅很大,文字冗长,内容繁杂,但它妄图说明的主要问题不外是:第一,黑龙江流域不是满族的故乡,它“始终处于满洲人实际控制之外”,因而不是中国的领土;第二,黑龙江沿岸地区是俄国新土地发现者“直接发现”的“不为人所知的新土地”,“已经在法律上纳入了俄罗斯国版图”;第三,1683—1686年中国清朝政府在黑龙江地区所进行的雅克萨战争是对俄国的“侵略”和“掠夺”,等等。如果把这些问题和苏联政府声明散布的谬论加以对

照,我们就会发现,作者虽然用了很多篇幅,绕了很大圈子,但是它的基本内容却是重弹苏联政府声明的老调。或者更确切些说,是为苏联政府声明散布的谬论制造“根据”和作脚注。

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中国的历代史书明确地记载着,满族人的祖先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自古以来就劳动、生息在白山黑水的辽阔富饶土地上。黑龙江流域一直是他们的重要基地。就连苏联近期在《远东问题》杂志上发表的《从考古材料看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女真人》一文,也不得不承认“阿穆尔两岸,不仅在女真族国家形成和兴盛时期,而且在晚得多的元朝和明朝时代,都住满了女真人”。既然满族的祖先自古以来就居住在黑龙江沿岸,这里当然就是他们的故乡,是中国的土地。所以,当十九世纪中期老沙皇侵占黑龙江流域时,恩格斯曾明确指出:“它(指俄国——引者)占领当今中国统治民族的故乡——黑龙江两岸的地方,才只有几年的时间。”^①可是,麦利霍夫竟公开否认这个事实,直接反对恩格斯这个论断。他用了大量篇幅,装模作样地考证什么“满族聚集的土地”,并得出结论说,“满洲人是阿穆尔河上的外来人”,因为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的基地——建洲卫在辽东一带地方,所以辽东一带“才是满洲人的真正故乡”。苏修御用文人用割断历史的手法伪造历史,甚至直接反对革命导师恩格斯的论断,恰好暴露了他反马克思主义的叛徒的丑恶嘴脸。

作者为了“论证”黑龙江流域不是中国的领土,还极力否认当地居民同清朝的隶属关系。中国过去的大量历史文献证明:清朝统治者在入关之前,已全部接管了明朝的东北疆土。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各部已属清朝管辖。可是,该书作者竟胡说什么“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滨海地区各个部落,到十七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既不是满洲国的藩属,也不是他的臣民。这些部落居住的领土,至多不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11页。

是满洲人侵略性袭击的对象”，并胡说这些部落向清朝纳贡，是什么“商品交换”；他们同清朝的来往，“是一般使团往来”，“带有外交关系和对外政治联系的性质”等等。不仅如此，他还挖空心思地捏造说，“现代的黑龙江”或者说“是包括松花江下游及其支流嫩江流域”，“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也不属于中国，而是什么“中间地带”。甚至说“在 1689 年尼布楚条约缔结后的长时期内”，这些地方“事实上尚未纳入清帝国版图”。这种对历史的恶意歪曲和无耻捏造，不仅是为老沙皇侵占中国领土作辩护，而且是在为新沙皇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根据。

这部书虽然题名为《满洲人在东北》，但它的实际内容却是通过歪曲满洲人在东北的历史，歪曲十七世纪中俄关系。这部书把十七世纪中叶，沙俄派出的武装匪徒，入侵黑龙江流域，侵占中国土地，残害中国人民生命的滔天罪行，当成俄罗斯人的英雄业绩，大肆吹嘘。说这些武装匪徒是“新土地发现者”，为俄国“发现”了“不为人所知的新土地”。而对中国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为驱逐这些侵略者而进行的雅克萨战争，反说成是“侵略行为”，是清朝政府“企图用武力把它的控制权扩张到俄国人居住并已开发的领土上”。这完全是颠倒黑白的胡说。作者在书中还不厌其详地一一列举了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沙俄在黑龙江沿岸地区修筑的城堡名字，开列了沙俄武装匪徒斯捷潘诺夫在黑龙江下游向当地居民征收实物税的清单，以说明俄罗斯人对黑龙江沿岸地区“开发的成功”。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列举了侵略中国的据点，摆出了向中国居民勒逼贡税的罪证。

作者声称，“本书基本上是根据满汉文件和资料写成的”，并吹嘘这是该书的“特点”和“优点”。这部书确实引用了大量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但是，作者并不以这些资料作根据去研究问题，而是任意歪曲这些资料去适应自己的观点。例如：人所共知的柳条

边,是清朝政府在辽河流域修筑的一条柳条篱笆,目的是用以标示禁区的界限,禁止一般居民越过篱笆打猎、放牧、采人参,它并不是什么国界。可是,作者硬说这就是清朝的北部疆界。中国历史文献只要一提到“边内”、“边外”字样,他就有意地把它译成“国界”以内或以外,并特意用着重字体排印,似乎为他的观点找到了什么“证据”。又如:中国历史文献上清清楚楚地记载着,1616年清太祖努尔哈赤遣兵征东海萨哈连部,1617年又招服使犬路。可是作者却极力否认,强调什么“没提到俘虏数字”,“无法想象满洲军队究竟走的哪条路线”,因而怀疑“是否确有其事”。作者对中国历史文献的态度是:他可以歪曲利用的,一个字,一句话,都紧紧抓住不放,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图随意发挥;与自己观点不利的,则极力否认,即使一件大的历史事实,也可化为乌有。从作者这种任意玩弄历史资料的卑劣手法中,我们可以看穿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历史学者”,搞的是什么样的“历史研究”。

象这样大量地利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来歪曲和篡改中俄关系的历史,在苏修出版的同类书籍中,这还是比较突出的一种。此书出笼,恰好暴露了苏修的窘境。他们为沙皇侵华罪行辩护的谬论遭到我们有力驳斥以后,自知在世界舆论面前输了理,于是又在中国历史文献资料上打主意,妄图把已被批臭了的谬论重新打扮一番,再蒙混一时,这是值得注意的一个新动向。我们将该书翻译出版,作为苏修反华的又一个反面教材,及时给与批判和揭露,粉碎他们反华的新阴谋。

该书作者出于偏见和无知,对书中引用的中国历史文献资料,生拉硬扯,牵强附会地胡乱翻译,以致错误百出,甚至闹出笑话。如康熙皇帝的一份上谕,提到“乌喇别无他事,彼土之人,惟好讦讼”,而作者竟把它译成“吉林地方暂无军事冲突,当地居民性喜暴乱”。并由此引伸出结论,说“吉林地区的居民根本不是什么‘满洲人’”,

“当地居民对满洲人不怀好感”。中国一位历史学家的文章中说：“清人入关前所并服东北诸部落之位置既明，则其开国初之疆域亦了如指掌矣。”而作者把它译为：清“开国初的边界就象伸开五指的手掌那样宽广”。由于该书引文和原意有出入，不少地方有意歪曲，因此在译稿中无法照填原文。为了便于读者辨别真伪，我们对该书引用的中文史料，一律按俄文照译，以脚注的形式附列原文，以资对照。

1975 年 11 月

目 录

引言	3
第一章 满洲人对东北各部落和各部族的 军事征伐(1583—1644 年)	29
第一节 努尔哈赤对毗邻各女真部落的征服和 统一(1583—1626 年)	29
第二节 十七世纪前半叶东北各部落和各部族的分布	52
第三节 阿巴海对东北各部族的军事远征	60
第二章 东北和阿穆尔沿岸地区(1645—1682 年)	97
第一节 满洲人侵入中国后东北的状况	97
第二节 阿穆尔河上最初的俄罗斯新土地发现者和俄罗斯人 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开端	106
第三节 满洲人关于东北的地理概念和清帝国的东北边界	119
第四节 清人和东北当地诸部落的相互关系	138
第三章 清帝国在阿穆尔沿岸地区的领土扩张 (1682—1689 年)	149
第一节 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经济开发的成就和 满洲军队对阿穆尔河的入侵	149
第二节 解决供应问题的种种困难和满洲人对 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的准备	162
第三节 第一次围攻阿尔巴津和清人在 黑龙江采取的下一步措施	193
第四节 满洲人对第二次攻打阿尔巴津的准备及其 毫无成效的围攻	200

结语	214
注释	227
附录	242
书目	251
人名索引	280
地名索引	291

引言

[3]

阐明满族在哪一块领土上进行聚集和满洲人在十七世纪前半叶在远东的军事远征的性质等问题,以及清帝国对东北*土地的兼并史和开发史,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

无论清帝国于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武装入侵阿穆尔^①沿岸地区的历史,还是1689年第一个俄中尼布楚条约的签订,都同这几个基本问题密切相关。

只是在十七世纪,清朝统治者在东北极力继续侵占并侵犯到东北的边界以外的地方时,才同俄国的利益发生冲突。而当时俄国已顺利地实现了对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经济开发,并已把这一地区纳入自己版图。清代中国在上述地区的扩张,从这时起便变成远东国与国之间关系的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使以后时期俄中关系的全部历史受到了深刻的影响。

上面提到的某些问题,直到现在在专门著作中还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事实上这些问题还是第一次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因此,在本书中自然也不可能得到彻底、圆满的解决。

同时,诸如满族的聚集、满洲人的国家组织及其特有制度的形成,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的历史等问题,都需要加以专门研究,因此

* 东北——系指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东北三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自治区的部分领土。然而,十七世纪时这些地区尚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十七世纪对该地区不能使用“满洲”这个术语,因为满洲诸部本身当时只占据上述领土的一小部分,用“满洲”来表示这一地区只是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事。据此我们今后只好把“东北”(Северо-Восток)这个术语作为地理概念来使用,但比现今“东北”(дунбэй)这个名称,意义要狭窄些。

① 即黑龙江。——译者

[4] 本书没有予以阐述。本书只研究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的一个方面,即只研究其领土方面。

本书基本上是根据满汉文件和资料写成的,这些文件和资料可以补充我们前辈著作中所使用过的俄国档案文件的资料。本书所用史料均取自它们的汉文版本。汉语是清帝国三种官方语言之一(与满语和蒙语并列),清帝国出版的每一种官修著作必然有其汉文版本。

正是这些满汉文献资料使我们能够最有说服力地、最完备地描绘出清帝国在远东扩大其政治势力的真实情景。这些新的、首次应用于科学的历史资料 and 文件,不论对进一步研究俄中关系史(更广泛地使用中国文件和资料的必要性早已成熟),还是对研究十七世纪远东各国、各民族政治历史的各种问题,都是珍贵的史料。

* * *

本书所使用的主要中国史料可分为三类:第一类,也是最重要的一类是官修的从1583年至1689年的政府编年史——满清四代皇帝的《实录》,以及收集在《八旗通志初集》和《平定罗刹方略》¹两部著作中的官方刊印的文件。

第二类史料是官修东北地方志书——《盛京通志》和《吉林通志》。

第三类包括非官修的、私人撰写的地理志,首先是杨宾的《柳边纪略》、吴振臣的《宁古塔纪略》,以及萨英额的《吉林外纪》和西清的《黑龙江外纪》。

第一类史料中,本书使用的有《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清太祖武皇帝努儿哈奇实录》、《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大清世祖章帝实录》、《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这些汇总于《大清历朝实录》中的记事的书,是各种档案资料和文件的汇编。这部著作是把藏于

盛京(沈阳)皇宫的手抄本之一用照相方法复制成有原书四分之一^[5]大小的印本。它是根据伪“满洲帝国”政府国务院的专门委托,于1937年在日本出版的,共印行三百部。在清帝国选编《实录》资料的工作由专设的机构进行。这一事实证明这一文献资料的编纂方法有着明确的目的性,反映了官方的倾向性。然而《实录》的浩瀚篇幅以及书中对公文原件的使用,可以使人认为,书中有足够数量的客观报道。例如,编纂《实录》所使用的资料目录中仅在“命将出师、大军凯旋、献俘纳降记”^①的简短的条目里,就包含着记载努尔哈赤和阿巴海²时期对满洲领地周围的北方、西方和东方诸部和对中国所进行的军事远征的广泛而又极其丰富的材料。

虽然在阿巴海时期,满洲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全部基础均获得进一步发展,但在记载阿巴海统治时期的《实录》中,军事性质的资料仍然占有最大的比重。军事活动、对战略战术问题的研究、同毗邻各族的战争——所有这一切构成了满洲第二个汗的活动的全部内容。

在使用这部文献资料时应注意下述情况:远在满洲人侵入中国之前,满洲国政权中央机关的形成便受到了明朝国家机关结构的重大影响。满洲人除了因袭这一机构外,还采纳了中国的一些政治观念和制度,其中包括纳贡制度。对中国来说,这种纳贡制度是同接壤各民族和远方民族的对外政治联系的唯一形式,它同时也是在一定政治观念的产物。在这些政治观念中占最重要地位的是中国皇帝对邻族拥有无上的权力,中国皇帝把周围世界看成华夷,即由中国本土和它周围的所谓蛮夷组成的独特世界,四周围是特殊的“蛮夷”之地。满洲人也开始希望他们的汗对邻族拥有无上

① 查原书无此条目。在《大清太祖高皇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有一条是“命将出师、指授方略及凯旋宴劳书”,在《大清太宗文皇帝实录》的“修纂凡例”中有一条是“……献俘纳降”。——译者

的统治权力；用满洲中心主义来代替所谓中国中心主义。与此同时，应该指出，《太宗实录》是在满清王朝定鼎中国之后编纂的，当[6]时满清统治者已采用了中国的全部官方和外交用语。这些用语在上述文献资料中得到了反映。在中国官方公文里，在谈到同东北诸部的相互关系时，开始用“纳贡”关系来表示，这些部落所进方物被看成是他们进献给满洲统治者的“贡品”。

这个相当晚才进入满洲文献中的新用语，同满洲头几个皇帝特意推行的千方百计吸引这些部族归附满洲人的政策精神，显然是矛盾的。其实，《太宗实录》中所说的这种“纳贡”关系，只能是各小民族和部落对满洲人国家对外政策的唯一的表现形式。因此，对满清文献资料提供的证据应持特别慎重的态度。

稍后时期——顺治和康熙统治时期——的《实录》，包含着极其珍贵的资料，尤其是十七世纪——十八世纪前半叶清帝国对外关系的历史资料。研究者在这里可以找到大量记载满洲人对阿穆尔河上俄国居民点准备军事行动的、以及同签订尼布楚条约有关的各种事件的极为珍贵的材料。这一记述同俄国人相互关系的最丰富的资料汇集，可以使我们能够透彻地研究满洲人侵略阿尔巴津^①的各个阶段。

关于东北、阿穆尔沿岸地区、滨海地区各民族同满清的外交关系的资料，关于这些民族的各种各样的资料，也具有很大价值。可以断言，满洲人和清代中国对外政策的全部最重要的文件，在《实录》里都可以找到。

《大清历朝实录》堪称为极为珍贵的历史文献资料，除了优点外，也应指出它所特有的某些缺点。在为《实录》选择档案文件时，毫无疑问，是有一定的官方倾向性的，这当然会使这个或那个历史事件的真相遭到歪曲。这部文献资料的这种倾向性，还表现在所

^① 即雅克萨。——译者

收次要资料连篇累牍,而对研究者很有用的某些文件,其中包括一些皇帝谕旨,反而未被收入。此外还应指出下述情况:《实录》中的资料不是按题材分门别类编纂,而是按时间先后顺序编排的³。

所有这些情况,在使用这部文献的资料时,都应加以注意。 [7]

在目前已知的阐述满洲八旗历史的文献当中,最重要的一种是《八旗通志初集》。在这部文献里除了根据别人著作编成的材料以外,还包括根据原始资料编的篇章,这种原始资料在目前已知的任何一种历史文献里都未曾发现过。就这方面而言,这部文献是《实录》的极有价值的补充。

记载八旗牛录(汉语为“佐领”,相当于“连”)的形成时间和每个牛录的民族成分的卷3—卷10,记载八旗蒙古的卷11—卷12和记载八旗汉军的卷13—卷16,都具有重大价值。

然而,这部文献的最有价值之处,看来是包括满、汉、蒙各级军事家和政治活动家传记(近五千篇传记)的极为完备的那一部分。这部分占该文献将近四分之三的篇幅(卷129—卷250)。《八旗通志初集》所收的这些传记比收在其他官修或非官修的清代文献资料中和传记文献中的详细。这些传记里有一些不见于《实录》相应部分的皇帝谕旨、奏章和地方报告,这对补充说明满洲统治者一系列对外对内政策观点,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

这部文献中的传记资料,所收事迹至1735年10月8日(雍正13年8月23日)⁴为止。

由此可见,《八旗通志初集》对我们的题目⁵来说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资料。

《平定罗刹方略》(共4卷)是一部饶有趣味的史料。所有的版本均未指明它的出版地点、出版时间以及编者等等,因此过去被视为一部匿名作品。目前已有可能查明这部著作的编者和确定其成书年代。根据《大清圣祖仁皇帝实录》的资料,《平定罗刹方略》的

作者是翰林院掌院学士常书;编纂这部著作是康熙皇帝于1685年10月8日钦定的〔见12,卷122,页4上〕。文中提到的最后事件发生在1690年1月末。

由此可见,该书是在所述事件发生当时,即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末编纂的,比《圣祖实录》中相应部分的编纂时间要早。这使人对该文献所引用的资料极为注意。

- [8] 该书对事件的叙述始于1682年9月16日——密派满洲侦察人员郎坦和彭春前往阿尔巴津的日期。该文献的资料是一部与阿穆尔河上军事行动有关的档案文件专辑。其中绝大部分文件,后来都收入《圣祖实录》里了。但是人名、地名的音译没有象《实录》那样得到统一;其中不少文件与《实录》中所收的同一文件在措词上略有出入。对事件的叙述也没有严格按照时间先后顺序。这些特征也间接地证实《平定罗刹方略》比《圣祖实录》成书要早,因而使我们在使使用这部珍贵文献的资料时,可把它与前面提及的官修文件和资料汇编同等看待。

应当指出,虽然这部文献在取材方面比《实录》狭窄,但是其中某些文件,甚至康熙皇帝的某些谕旨,却是不见于《实录》的。正是这些资料为满清在阿穆尔河上的侵略历史补充了一些十分重要的详细情节。⁶

我们使用的第二类史料是官修的中国东北的地方志书。《盛京通志》是流传到今天的最早的东北地方志书之一。它初版于1684年。尽管书名是《盛京通志》,但是这部官修文献所提供的资料却不仅限于盛京地域本土,它还涉及到该书编者所知道的在该区域的全部毗邻地区。该书辟有专章,叙述宁古塔和吉林(卷8)地域。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1684年版本中还没有类似的叙述黑龙江的章节,只是简略地提到了爱浑城堡。

后来《盛京通志》曾多次再版,而且每次都有修改和大量增补。

目前我们拥有 1736, 1770, 1776 和 1782 年刊印的几种版本。1782 年版(最后一版)是“钦定”本,较以前各版篇幅显著增多。这一版本共 45 卷,其中包括首次列入的关于黑龙江的专卷。

这部文献资料中最有价值的资料是关于清帝国在东北的国界的部分(卷 8)。我们在考证十七世纪东北的各个地理名称同现代名称是否同一时,广泛地使用了该书中的历史地理方面的资料。

该著作各个版本所附舆地图也有一定价值,尤其是比较各个 [9] 版本的地图,可以弄清满洲人和汉人关于东北地区的地理概念的演变情况。

最早尝试摘译《盛京通志》中资料的是俄国汉学家 B. П. 瓦西里耶夫教授〔见 63, 第 1—77 页〕。在 B. П. 瓦西里耶夫的著作中所引用的资料都有作者的注释。由于对资料进行了精选,这部篇幅不大的著作充满了大量的实际材料。遗憾的是, B. П. 瓦西里耶夫的译文没有注明所据原文的页码和卷次。

为了考证东北地理名称,也为了搜集关于该地区居民的材料,我们利用了《吉林通志》这部文献资料。这部志书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编成问世。著名的俄国汉学家 A. B. 鲁达科夫教授对这部著作首次作了总的评价,提供了研究此书的书目资料,并且把此书的某些章节译成了俄文〔见 168, 卷 1〕。

在谈到我们利用的第三类史料——私人撰写的地理志——时,首先应该谈谈杨宾的《柳边纪略》。这部著作是少数流传至今的、由汉族流入直接在流放地写成的关于东北的著作之一。

这部文献资料,是关于清帝国东北边疆在不同历史时代(明、清)的各种资料的汇集。这部文献资料是关于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前半叶中国东北地区历史和生活的别具风格的小型百科全书,这使我们可以把它同《盛京通志》等量齐观。

虽然这部著作在科学上很重要,很有价值,但到目前为止,在